

“百亿杀手”争论背后：要科学，也要伦理

■朱香

为什么不要喂流浪猫?我国一年至少有 121 亿野生动物死于猫口!

2020 年 12 月,南京大学副教授李忠秋在一场科普报告中给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这组数据来源于李忠秋团队新近发表在《生物保护》的一篇文章,他们通过问卷方法,首次在国家尺度上评估了户外猫对中国野生动物的威胁。论文合作者是美国史密森尼学会候鸟研究中心主任彼得·马拉。

这项研究给出的最终建议是,社会对作为入侵生物的流浪猫做到“不散养、不遗弃、不投喂”,即让其自生自灭。

一旦涉及流浪猫的问题,撕裂永远存在。这一次,反对者终于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喂流浪猫不仅矫情,而且还有可能间接造成大量野生动物的死亡。而爱猫人士忧心的是,草率的言论一出,不仅会助长虐猫行为,还会让多年来民间组织 TNR(抓捕—绝育—放归/收养)行动的努力付之东流。

而且,这场争论背后吊诡的地方在于,一些野生动物保护支持者一方面希望尽可能调动广大老百姓对动物的同情心;一方面,又在面对流浪猫问题时,斥责爱猫人士同情心泛滥。

这时而伟大,又时而“该死”的同情心,人类究竟应该放在何处?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猫的存在让岛屿安静了下来

“对我而言,猫是如此熟悉的伙伴,几乎是从小生起就和我形影不离的动物,因而当我第一次听说猫被列为入侵物种时,十分愤怒。”

作为资深铲屎官,伦敦国王学院教授艾比盖尔·塔克曾经和很多爱猫人士一样,对把猫当作生态威胁的说法非常不解。但当他开始调查,研究家猫的驯化及爱猫热潮的进阶之路,并写作《人类“吸猫”小史》时,他发现,这个话题由来已久,且不足为奇。

家猫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动物,适应性极强,在与人类的相处中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具备随时离开人类、回到野生环境中的生存能力。因此,它们具有破坏一定范围内生态系统的能力,甚至可能导致濒危动物的灭绝。

19 世纪晚期,猫被引渡到南非的达森岛上后,就开始捕杀企鹅、鸵鸟以及鸸鹋。20 世纪 50 年代一支军队将猫引入墨西哥的索科罗岛后,当地一个鸽子物种迅速灭绝了。在关岛,猫盯上了关岛秧鸡——一种神秘珍稀而毫无还手之力的鸟类,由于猫的无节制追捕,目前关岛上已经没有秧鸡的踪迹了。在新西兰,猫扫荡了整个岛上无法飞翔的巨大鸟类——鸮鹦鹉……

“长期隔绝的岛屿是生物多样性最后的避难天堂,由于当地没有捕食者,猫轻而易举就能占据食物链顶端,从此猎物们无处可逃。它们甚至不会逃,这些单纯的岛屿生物往往缺乏反捕策略,甚至对猫缺乏本能的恐惧。这种现象被称为‘岛屿驯化’。它们就像乖乖坐着的鸭子,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束手就擒的盘中鸟。”艾比盖尔·塔克写道。

“制造”对猫的恐惧

在以上这些故事里,猫就是入侵生物。但需要注意的是,科学上对于入侵生物的定义,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条件——“在一个特定地域的生态系统中”。

而李忠秋将所有生活在户外的猫都视为生态

威胁。这一绝对的主张究竟是怎么来的?

2013 年,马拉在《自然—通讯》发表了一项“突破性”研究,他们通过一个简单的建模操作,第一次估算出了在美国本土范围内由猫致死的动物数量。

针对死亡数量问题,他们首先梳理了所有的科学文献,涉及猫导致的两栖动物、爬行动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的死亡数量,以求获得一个最佳数目,嵌入他们的模型。

这个数字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高得多:美国的猫每年杀死鸟 13 亿到 40 亿只,哺乳动物 63 亿到 223 亿只,两栖动物 9500 万到 2.99 亿只,爬行动物 2.58 亿到 8.22 亿只。总计约 150 亿只。这在当时的西方媒体引起轩然大波。

马拉在他后来的著作《猫战争》中说道,生态学家面临着—个重要的哲学性的障碍——普通个体难以把握流浪猫问题的严重性。而生态学家终其一生思考和研究“规模”的概念——量化一个截取的数据点,按比例放大到一个城市,然后是一个地区,最后是一个大洲的规模。

问题是,这样的研究要达到科学上的有效性是极其困难的。很快,他的论文便受到了专业人士的强烈质疑。理由是,美国大陆地区对于家猫猎杀的研究本来也不多,马拉推测的数据来源的地区尺度大小不一,将有限的具体的研究过度泛化到全美,就好比将整个美国当成一座太平洋小岛,从而得出危言耸听的结论。

可就是这样—个备受争议的研究思路引入了国内。更让—些专业人士不解的是,李忠秋团队研究的所有数据来源是问卷调查。

事实上,马拉在统计建模的过程中,是排除了一部分研究结果的,其中就包括了采用问卷形式要求人们回忆猫的捕猎经历的研究。可见这种方法得到的是一种低级别证据,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更好的证据,来自无线电项圈、“小猫摄像机”、粪便分析等比较精确的跟踪研究。

长期研究动物伦理学的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及动物保护研究人员公开撰文,指出李忠秋团队的论文在研究方法上存

在的缺陷,会影响其所得出数据的科学性。这些缺陷包括问卷调查本身的局限性,如回答者回忆的不可靠、取样的偏差等等。

李忠秋表示,之所以选择问卷调查的原因是,在中国没有关于流浪猫捕食野生动物的基础研究数据。

在美国,对于流浪猫的研究经过了近百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公众可以听到各种声音。郭鹏担忧的是,当一种在科学上并不严谨的方法,突然闯入国内,并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据结论,可能造成一种后果,那就是武断的言论炮制者由于优先控制了整场讨论而变得没有敌手。

尽管有人发出不同的声音,但支持者秉持的态度是,不完美的数据也是数据,如果有人想要表达流浪猫没有那么大的威胁,请拿出你的数据,没有数据就没有发言权。

这让原本—场合理的科学讨论,陷入了一种诡辩的逻辑。

清除所有流浪猫可能吗?

2007 年,加利福尼亚的离岸圣尼古拉斯岛经历了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人们清除了岛上所有 59 只猫,对它们实施绝育,并全部运送到了收容所。

整个过程源于一场长期计划,18 个月的设陷,使用 250 个捕兽夹,还有追踪犬,以及陷阱监测系统。而驱逐这些猎捕本土鹿鼠和国家保护物种夜蜥的猫,总共花费了美国政府 300 万美元。在猫都是生态威胁的结论下,马拉的观点是,优先选择清除所有户外的流浪猫。不一定是杀死,也可以是领养、收容。但无论是论文还是著作,马拉并没有指出清除所有户外的流浪猫会产生什么影响。

艾比盖尔·塔克在《人类“吸猫”小史》中给出的文献资料显示,一旦猫在生态系统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几乎不可能把它们驱逐干净。它们有惊人的繁殖能力,几只“漏网”之猫就足以让它们恢复和从前—样庞大的族群基数。所以,即便在岛屿上也有大约 20% 的剿猫行动以失败告终。

生物多样性保护高于动物伦理吗

■本报记者 胡琨琦 实习生 张思璇



宠物一旦背上了“生态杀手”的骂名,允许被清除似乎是一种理性战胜情感的选择。其中隐含的判断就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价值更高,而爱猫者的怜悯是狭隘的,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在作祟。

可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要事实是,人类所生活的环境已经为人类文明所支配。既然人类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回到前文明时代,就必须直面人类文明所带来的问题,包括流浪猫带来的城市生态问题。如何在这样一个基本的概念框架下来讨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动物伦理产生的冲突问题?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郭鹏。

《中国科学报》: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如何平衡科学与道德伦理?

郭鹏:无论在荒野生态还是在城市生态问题上,科学与伦理都不冲突。科学的目的是给我们客观地呈现事实,而伦理的目的是让我们符合道德地行动。科学有可能受限于自身研究的方法、概念框架以及研究范围,从而对于事实的呈现不够全面、客观与准确;同样,伦理有可能受限于习俗、成见甚至现实条件,因而无法将一些基本道德原则贯彻到底。无论如何,科学的目标是客观地呈现事实,伦理的目标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遵守公正、仁爱、尊重与不伤害等一些基本道德原则。

在如何对待动物的问题上,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所呈现给我们的事实是行动的依据,伦理所考虑的是如何行动才符合道德。比如,在我们对待动物(特别是个体)的具体行动上要符合基本的道德要求,除了不能虐待动物这个底线,我

们还要考虑到动物自身的利益与福祉。

其实,除了伦理之外,还需要政治,因为涉及到公共政策与法律,这些都不是个人行为。政治的基本要求就是正义与公正。而在动物正义这个问题上,科学同样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社会科学。在社区猫的问题上,我们不只是要研究这些动物在城市生态中的角色与作用,我们还要研究它们的社会角色与作用。只有多学科结合,才能够呈现给我们—个比较完整与客观的画面,才能够成为指导我们个人行为与公共政策的参考。

《中国科学报》:您认为,客观上存在对流浪猫的过度保护问题吗?

郭鹏:动物伦理反对生态暴力主义,并不是反对保护生态多样性;同样,在许多问题上,如畜牧业造成的环境污染与人类活动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破坏,环境伦理的结论可能都指向人类的行为

才是罪魁祸首,但是伦理学(包括动物福利理论)并不会因此主张强迫所有人都成为素食者或干脆消灭人类。

我不觉得生物多样性保护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做违反道德的事。更多的时候,我们在两方面都要做出让步。比如,保护生态多样性不能为生态激进主义甚至生态暴力正名;而尊重动物个体的权利与利益,也不会拒绝以最小利益损害的形式出现的合理调节措施。其实,TNR(抓捕—绝育—放归/收养)就是这样—个综合的结果。

《中国科学报》:科学家如何在那些可能冒犯到人类情感的话题上与公众沟通?

郭鹏:首先,作为科学传播者,需要真诚地面对自己所要影响的对象,即公众,尊重他们的理解力(这不是由于业有专攻,更重要的是,每个学科所运用的基本概念体系其实都是

并且有的时候,由于原先的生态系统已经被猫彻底摧毁,这种情况下减少猫的数量反而有害无益。2000 年麦夸里岛成功扫除了所有的猫,但紧接着数量激增的兔群“饕餮”了岛上 40% 的植被,由此引起的滑坡将企鹅群埋入土底。

“真正的困难在于科学家们所谓的猫的‘社会接受度’,人们就是见不得猫被杀死。”艾比盖尔·塔克注意到,“人”的因素不可能被剥离。

既有温度又讲道理的保护生物学

清除所有流浪猫,看似有包罗一切的气魄,实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逻辑。这种想法,不仅矮化了保护生物学所拥有的智慧,也和这个学科的广阔世界观背道而驰。真正的保护生物学既得到来自野生动物的遥远的呼救,也能包容人类近在咫尺的同情心。

北京大学保护生物学课程中强调,保护生物学有其重要的原则。首先,生物多样性保护从来不只是科学问题这么简单,还包括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环境法学、哲学等;其次,人类参与是不可能被排除在外的,这就需要体察人的需求、欲念、规则、体制、文化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考虑其他物种怎么生存。

更为重要的是,保护生物学是解决实际冲突和矛盾的学科,怎么才能把实验室的研究变成有用的东西,这是它尤其关注的内容。

藏区流浪狗冲突问题就是一个案例。流浪狗,一方面不惧怕人类,虽是拾荒者,但却可以肆意攻击人类;另一方面,牧民的生活区域与野生生态系统很接近,流浪狗回归半野生状态,又具有很好的社会性,能与野生动物展开资源的争夺。

世界各地应对流浪狗威胁的方法,主要是手术绝育,建立收容中心或者有计划地捕杀。但藏区流浪狗问题究竟该用什么方式解决,并不能简单得出结论。为此,多年前青海省雪境生态宣传教育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雪境)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学调查,并和政府、寺院、村庄等多个不同利益群体进行了深入访谈,了解他们对于流浪狗问题的认识和解决方案的倾向。

在藏区,因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藏民对流浪狗的容忍程度非常高,因此,有计划地部分捕杀一定区域内的流浪狗会遭到藏民的强烈反对。而且,有研究表明,通过捕杀控制流浪狗种群的办法很多时候并不能奏效,需要一个地区在大范围内同一时间实施才能保证效果。

政府和—些民间组织在藏区建立了一些流浪狗收容中心,进行集中管理。但对他们而言,随着收容数量的快速增加,面临巨大经济压力。

2017 年,雪境提出的最终方案是以绝育为主。通过政府出资和补贴培训激励当地兽医对流浪狗进行绝育手术来控制其数量增长,并联合寺庙的力量促使更多的当地百姓领养流浪狗。这就是 TNR 方案。

尽管马拉和李忠秋质疑 TNR 本身作为数量控制手段存在缺陷,不应该支持;但研究显示,在不同环境和执行标准下,TNR 的效果是千差万别的,不能一概而论。

雪境一直坚持这样的理念:必须与当地社区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保护决策的选择不是因为它是—个完美的方案,而是在众多不完美的方案中,它是那个最能够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

凝聚共识,不是仅仅靠科学知识灌输说教,而是要有方向地启发引领、互动式协商讨论,求得公众内心的深刻认同。只有这样,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才真的可行。

相关论文信息:

<https://doi.org/10.1016/j.biocon.2020.108690>

<https://doi.org/10.1038/ncomms2380>

后疫情时代的悄然来临,使线上艺术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这种看似“不得已而为之”的应急策略,其实是艺术与科学技术在数字时代相互融合的自然结果。那么,传统艺术“飞上云端”之后呈现出了怎样的审美特征,又为后疫情时代的艺术发展带来了何种启示呢?

首先,线上艺术直接打破了传统审美活动的时空局限,使文艺“大众化”和“全球化”成为可能。传统文化艺术受众较少,很大程度上是由传播空间和传播渠道有限造成的。互联网技术却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拉近文艺作品与受众之间的距离,使艺术真正有机会走入人们的日常生活。2020 年,国家大剧院分别以“春天在线”“声如夏花”“华彩秋韵”和“冬日之约”为主题,组织了四个系列的线上演出活动,涉及歌剧、话剧、音乐会、芭蕾舞、戏曲等多种艺术门类,每周六晚通过金网平台直播,并且可以长期免费观看,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目前,前三个系列活动的点击量已经超过 10 亿次,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业余文化生活。

无独有偶,2020 年 9 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倡导发起的“全球博物馆珍藏展示在线接力”活动成功举办,来自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南非等 16 家博物馆参与接力,通过网络为全球观众展示馆藏珍品、阐释文物所蕴含的人文精神与时代价值。这意味着,观众足不出户即可领略世界文明之精华,同时通过直播与博物馆馆长进行互动交流,更深入地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在线欣赏,固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审美体验的真实感和现场感,却也为艺术提供了更多走近大众的机会,让艺术变得触手可及、平易近人,从而为传统艺术注入新的生命力。

其次,线上艺术改变了传统艺术以“静观”为主的审美方式,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互动性。在传统的艺术审美过程中,尽管有艺术品做纽带,但艺术家与观众之间却大都互相隔膜;艺术家的创作过程,观众无缘得见;观众的赏鉴过程,艺术家亦无法参与。但是,线上艺术却可以将艺术家的创作过程直接通过网络展现在观众面前,还可以在创作的同时让艺术家亲口讲述作品的灵感与内涵,甚至邀请观众共同参与创作。这与近年来热门的“沉浸式”艺术理念不谋而合,即注重观众的参与度,通过感官共振拉近艺术与观众之间的距离,并最终实现两者之间的对话与互动。

同时,在 AR(增强现实)、VR(虚拟现实)、3D 全景扫描等数字技术的支持下,线上艺术可以将展品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在观众面前。比如,在“数字敦煌”的官方网站,观众可以看到各个洞窟的全景影像,将细节放大后,还能清晰地看到每一尊彩塑和每一幅壁画的纹理。而与全景影像相配合的文字解说,可使观众更深入、更系统地体味敦煌艺术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线下看展所无法比拟的独特体验。更有意思的是,敦煌研究院还和腾讯联合出品了小程序“云游敦煌动画剧”,一方面以动画剧形式展示、解读、传播敦煌的壁画故事,另一方面,网友还能自行选择剧中角色,参与故事配音,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吸引力,颇具趣味性。这类注重“参与性”和“互动性”的传播方式,不仅可以增加艺术作品本身的魅力,还能丰富观众的审美体验,引导他们进一步思考个人与周围环境、与历史文化的关系,可谓一举多得。

2020 年 4 月 15 日“世界艺术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意发起“坚韧艺术”(Resilient Art)全球运动,揭示疫情影响下的文化产业现状,探讨后疫情时代恢复文艺事业的方法与策略,以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可行性。可见,“文艺”应该如何“复兴”,是全世界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共同难题。在此背景之下,线上艺术的勃兴,便不仅仅是疫情压力下的“自救”策略,更透露出一种长远的发展趋势: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当代艺术的审美方式与审美形态。只有坦然迎接和研究新技术,并将它转化、运用到艺术中,才有可能使“艺术+科学”的组合真正熔铸为“向美而生”的力量,为数字时代的我们抵达真理、表达情感找到一条合适的途径。

(作者系陕西智慧社会发展策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后疫情时代,「文艺」如何「复兴」

■朱佳宁